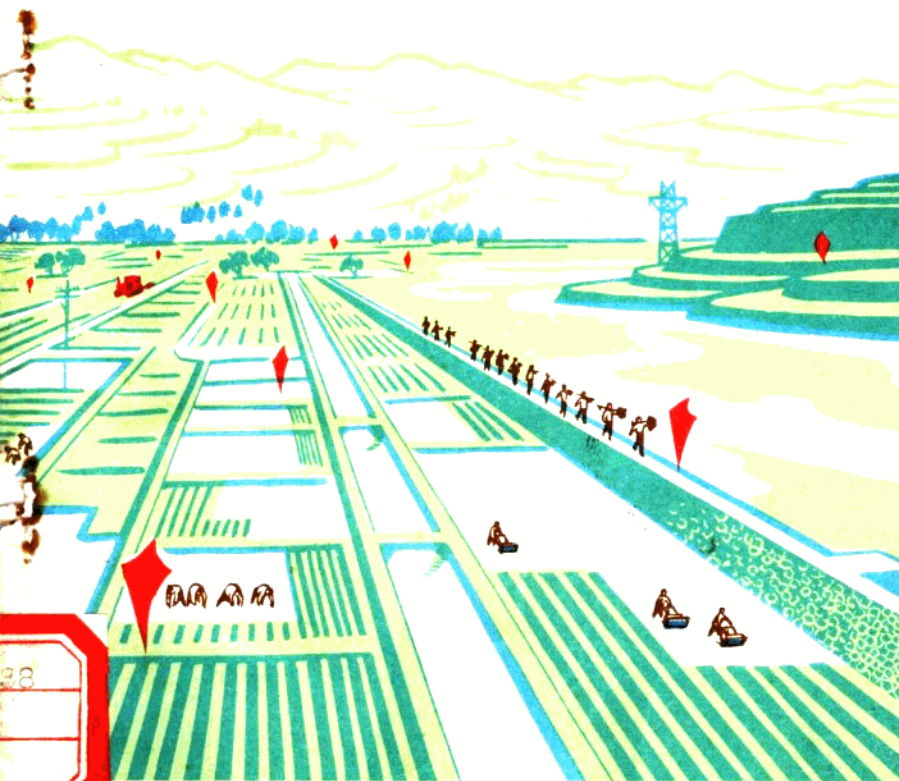


晋阳人民的新胜利



毛主席语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农业学大寨

目 录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大批大干促大变·····	(1)
“没见过的大旱 没见过的大干” ·····	(19)
在抗旱斗争第一线上·····	(28)
最可贵的是风格·····	(36)
大办农业的新局面·····	(43)
昔阳人民的新胜利·····	(51)
昔阳学大寨的第七个冬天·····	(59)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大批大干促大变

中共昔阳县委员会

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昔阳县经历了连续十七个月的大旱。到“入伏”以后，正是庄稼吐穗扬花的关键时刻，又连续旱了四十二天。“处暑”后，又是阴雨连绵。这样反常的气候，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但是，全县人民在批林整风的推动下，抓阶级斗争，抓路线斗争，抓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发动全县人民，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以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干，战胜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旱，战胜了连续的自然灾害，一九七二年争取了一个较好的收成，一九七三年又夺得了农业大丰收。

昔阳县在文化大革命前的粮食产量是不高的。一九六六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八千万斤，平均亩产二百多斤。从一九六七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来，到一九七一年，总产量就上升到二亿三千六百二十万斤，亩产达到六百四十一斤。五年时间，粮食产量增长了近两倍。一九七三年，旱灾、涝灾虽然严重，但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六百四十八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七年粮食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八。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县的粮食情况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多了：一九六六年，我们全县交售粮

食一千三百八十八万斤，后来吃了返销粮七百万斤，实际交售的只有六百八十多万斤。一九六七年以后，从二千六百万斤，一直增加到一九七一年的八千万斤。六年平均每年交售四千一百四十三万斤。

社员的口粮多了：一九六六年，全县平均口粮是二百八十六斤。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还年增长到五百二十三斤，一九七二年还保证了四百六十斤。

集体储备的粮食也多了：七年来，我们从无到有，到一九七二年年底，全县储备粮达到了近二千万斤。同时百分之七十的社员户有了存粮。

一九六六年，全县农、林、牧、副的总收入是一千四百二十四万元，其中林、牧、副业收入仅四百多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一九七三年的总收入预计在四千万元左右，林、牧、副业的收入可达一千四百万元左右，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林、牧、副业的收入七年增了两倍半。

七年来，农业生产有了比较快的发展，抗灾能力也大大加强了。因为我们在建设大寨式县的斗争中，下定决心，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千方百计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我们全县实有的劳力是七万二千个，七年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工即达四千五百九十七万个，平均每年投工六百五十七万个。七年中完成六千六百二十四项工程，共做土石方总数达七千三百三十八万多方，基本治理了五条川、三千条沟，打了总长达一千三百多华里的大石坝，砌了四十七华里涵洞，造了五万二千亩新土地，建设了三十二万亩大寨田，发展了六万九千六百亩水浇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近两年的情况。近两年来，尽管遇到

严重的干旱，当年生产的投工量大大增加，但我们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并未停止。一九七二年，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工数达到八百六十五万个，完成了一千二百七十多项工程。一九七三年，完成的工程项目又增加到一千八百多项。昔阳县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地面积仅有八千亩，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五年发展了一万零一百多亩，在大旱的两年中，就发展了五万一千五百多亩。

七年学大寨，建设大寨式县的收获，远不止是生产条件上的变化，不止是粮食产量的上升，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解放前，昔阳县富裕中农每人每年的收入是五十到六十元。现在，全县农民的平均收入一九七一年是九十七元，一九七二年大旱，还达到七十八元。广大农民从工程上、生产上、生活上，特别是从战胜连续二年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得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社会主义制度绝对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集体经济的力量绝对优越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力量，大寨道路绝对优越于资本主义道路。

昔阳县学大寨、建设大寨式县的路子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呢？县委认为，七年来，我们着重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学大寨运动才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且轰轰烈烈地坚持了下去。

第一，不停顿地开展革命大批判

我们昔阳的群众爱说这么一句话：大批促大干。这不是一句随便的话，而是大家七年学大寨的一条根本性的经验。我们深深体会到，学大寨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问题，而是一

个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问题。大寨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不相容，不批修正主义学不了大寨，不批资本主义学不了大寨，不批资产阶级的一切坏东西也学不了大寨。

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是一九六四年发出的，但是，到一九六六年，昔阳还学不起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有人公开规定“只有百分之六十的地方可以学大寨”，有人在昔阳提倡“一分麦、二分菜”，提倡“产量包到户、荒滩分到户、牲畜放到户”，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却叫喊什么“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修正主义的路线支持了资本主义的妖风，弄得人心七股八岔。因此，一九六七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发动全县人民，抓住修正主义路线批，抓住资本主义倾向批。人人批，处处批，我们绝不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和平共处”。这场大批判搞得声势浩大，气势磅礴，席卷全县，批得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臭不可闻，使广大群众扬眉吐气，使大寨精神到处开花，学大寨运动就是在革命大批判的推动下开展起来的。

全县学大寨，到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搞得更加轰轰烈烈了，群众的劲头也更大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人说昔阳学大寨是搞了“一平二调”。这股冷风确实也在昔阳吹起了一些浪花，有人怕犯错误不敢干了，有人把我们已经搞了几年的专业队也悄悄解散了一部分。昔阳的学大寨运动遇到了一次严重的冲击。但是，我们县委在陈永贵同志的主持下，不是撤退，而是发动群众，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展开了群众性的大批判。县委开常委会批，县

级机关也批；公社干部批，大队发动社员批，革命大批判的强劲东风，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清了：林彪不是想“一个早上”进入共产主义，而是睡思梦想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全县学大寨，并不是过了头，而是群众运动的规模和声势还不够大；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不是应该收兵，而是应该发展。正是通过革命大批判分清了路线和方向，我们才把原来四千人的专业队扩大为八千人，把原来不敢干的水峪水库、杨家坡水库、引溪入松工程上了马，掀起了更加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一九七一年，全县搞了七百九十多项工程，一九七二年搞了一千二百七十八项，一九七三年上升到一千八百八十二项。

我们开展革命大批判是紧密联系实际。什么东西反对、破坏、妨害学大寨，我们就批什么，而且一定要批出个结果来，没有这样的气魄，学大寨就是一句空话。

党的十大以后，我们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十大文件，开展批林整风和基本路线教育的高潮。有人说，现在，昔阳是争地、争肥、争劳力的问题解决了，自由市场没人跑了，丢了农业搞副业的偏向也纠正了，资本主义倾向不是个问题了。真是这样吗？完全不是。在陈永贵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大寨大队党支部首先把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同大寨的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小学生摘苹果的小事，发现了全大队存在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有的社员有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的行为，全大队因此就损失一千四百多元。又通过留庄大队搞试点，发现在最近几年间，这个大队化公为私、损公肥己，使集体损失达一万元以上。陈永贵同志对两个大队的调查大大教育了县委，使我们认识到：化公为私，损公肥己，是资本主义倾向在新形势下的新反映。把社会主义的财产据

为已有，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用国家的建筑材料盖房的，有用集体的木料做家具的，甚至有的人是背个提包走进来，两辆卡车拉出来，把社会主义的财富变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这种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的事情，损害了集体经济，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妨害了学大寨运动。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我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反映。因此，我们就向全县各级党组织提出了认真学习十大文件，深入开展基本路线的教育，坚决纠正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的不良倾向。县委提出了“思想上反腐败，经济上反蚕食”的口号，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学大寨大好形势的战斗任务，放手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掀起了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对资本主义倾向的大批判。县委常委带头批，带头查，带头改。党员带头批，带头查，带头改，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贯彻十大精神，落实党的基本路线的高潮，这就大大推动了全县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在秋收全面展开的同时，百分之三十的劳力就开上了农田水利建设的工地，比往年提前一个多月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

总之，学大寨就要批修正主义、批资本主义、批一切资产阶级的东西，只有把资本主义的西风批下去，社会主义的东风才能吹起来，学大寨运动才能春风化雨，满地开花。

第二，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学大寨，没有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是不行的，一

支坚强的干部队伍却只有正确地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才能组织起来。

过去多年来，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干部问题上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尽管他们的手法、花招不一样，目的是一样的，这就是千方百计地打击、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他们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专政。对人民内部的问题实行“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有些干部的革命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就仍然是一句空喊的口号。七年来，我们昔阳学大寨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反对刘少奇、林彪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是落实毛主席干部路线的过程。

一九六七年，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一成立，就作出了开展学大寨运动，三、五年内把昔阳建设成大寨式县的决定。但是，决定下去没人干。因为当时党的干部政策没有落实，干部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

一九六四年在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对昔阳干部的伤害是很大的。那一次，一下整了二百多个县、社、队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县又有一批干部受到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

事情很清楚，不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落实不了党的干部政策，就解放不了干部，就教育不了干部，也团结不了干部的大多数，更无法搞五湖四海。不搞五湖四海，搞一团一伙，干部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干部不积极干，学大寨就不可能搞好。我们在发动群众学大寨的时候，首先发动全县人民，以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一系列伟大指示，对刘少

奇在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我们坚持了加强领导，依靠群众，划清界限，在大批判的基础上，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敌我矛盾，一检查、二教育、三信任、四鼓励。特别是对那些执行过错误路线的人，我们坚决执行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的政策。团结他们，信任他们，对他们一视同仁。这样，就把大多数干部团结起来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许多同志感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誓要下决心搞社会主义，走大寨道路。动员全县人民学大寨，是和广大干部的带头实干，积极苦干分不开的。李家庄公社是一个典型，原来这个公社有七十六个社、队干部立了案。一九六七年，批了反动路线，把错案纠正过来，干部的思想大变，带领群众大干，头一年就使产量翻了一番。

我们坚持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绝不一棒子打死，更不踢开不管。南塍大队的原党支部书记赵志武，过去搞投机倒把，使南塍大队成了搞资本主义的黑窝窝。但是在整党建党以后，我们对赵志武坚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的原则，对他采取耐心教育的方法。结果，使赵志武认识了错误，坚决改正了错误，一九七一年，又选他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如何对待老干部，也是一个关系到学大寨运动能不能很好开展的大问题。老干部是在革命斗争中经过长期考验的，绝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有较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在群众中是有威信的，是革命的财富，而不是革命的“包袱”。只要是能工作的，我们就尽量让他们工作。有一些干部实在因为年纪大不能工作了，我们也坚持做到三条：

一是生活上关心，二是政治上相信，三是工作上依靠。县里传达中央精神，请他们来；开三千会，都请他们来；有重大的工作，还要请他们来商量。昔阳是老区，老干部多，这是我们做好工作，学好大寨的一个有利因素。

七年的实践使我们还有一点体会，就是“没有相对稳定的干部，就没有相对稳定的产量。”反对搞一茬庄稼一茬干部。过去，有过这种情形，年年换干部，谁也没有长期打算。干部说：“凑凑付付过一年，秋后好交班。”这样的干部是学不起大寨来的。我们平时很注意选干部，一旦选出来，就要加强管理教育，就不能随便换干部，即使头一年上不去也不换，而是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因为当干部，领导群众学大寨，有一个熟悉、锻炼、提高的过程。

总之，干部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大问题。学大寨，没有一支政治上坚强、工作上积极肯干的队伍是搞不好的。而干部的积极性能不能调动起来，关键又在于敢不敢清算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能不能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肯不肯解放干部，搞不搞五湖四海，会不会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第三，千方百计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

学大寨，建设大寨式的县，一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二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结果，是全面地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结果，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离开了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

行党的政策，群众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

这个问题我们是从斗争中认识的。文化大革命前，昔阳和大寨唱的不是一个调，走的不是一条路。大寨狠抓土地基本建设，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全县不少地方却搞什么到阳泉、赞皇、太原等地去搞副业，开荒刨小块地。一个积极性是搞社会主义，一个积极性是搞资本主义。大寨对社员开展路线教育，把落实政策当作调动社员搞好社会主义农业的重要措施，有的地方却泛滥“赚钱第一”，把所谓“落实政策”当作搞资本主义的手段。结果，大寨的集体经济越办越好，生产年年上升，收入年年增加，口粮年年提高，卖粮年年增多，而全县的粮食产量却从一九五八年的一亿多斤下降到八千万斤，社员的平均收入只等于大寨的一半。这个问题在当时不可能辩论，也辩论不清。一九六七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我们就在广大群众对资本主义的大批判中，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大家明确了积极性有两种，干劲也有两种：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有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有社会主义的干劲，也有资本主义的干劲。我们执行任何一项政策，采取任何一个措施，都应该从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鼓社会主义干劲出发。落实政策，不能忘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落实政策要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鼓起群众的社会主义干劲，只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到学大寨上，调动到集体地里，而不能把积极性调动到自由市场上，调动到小块地里。落实政策，要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使广大群众感到社会主义好，集体化的道路好，而不能越落实越成了吃粮靠小块地，花钱靠个人副业。李家庄公社

的石坪大队，现在我们全县学大寨的尖子队。但是，这个大队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很落后的。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大队的党支部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有问题，调动起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是资本主义积极性。一九六七年开门整党，发动群众揭石坪的问题，揭来揭去揭到了方向上。群众批评党支部是：“搞歪了政策，走偏了路线。”党支部书记陈有堂认识到，自己只记得具体政策，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结果调动起来的不是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越调动，人心越七股八岔，就学不起大寨来。从此，石坪党支部才清醒过来，下决心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干部和群众，把落实政策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农业学大寨结合起来，发动群众用劳动为社会主义创造财富，用政策来保证社会主义方向。从那以后，石坪连干四年，治理了三条大干河，砌起了总长五千多米的涵洞，造了大片好地，粮食产量一下增加到二百四十六万斤，比一九六六年增加了四倍。

是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是调动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始终是有斗争的。一九七二年，遭了大旱。我们认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越要全面地执行党的政策，发扬社会主义制度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用大干战胜困难。但是有些灾情较重的地方，有人却在困难面前提倡各顾各，各奔前程。实际是让社员自找门路，靠自己渡荒，宣布了集体经济无能为力。奇怪的是他们竟把这种做法叫做“执行党的政策”。我们县委坚决反对这种歪曲政策的做法，坚持贯彻执行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互相支援，依靠集

体战胜困难。正是抓住了这一条，我们才保证了全县社员在灾年有四百六十斤口粮。在灾情特别严重的界都公社，社员含着眼泪说：“毛主席领导好，社会主义好。”由于正确地执行政策，这个公社学大寨运动没有因为天灾受到影响。相反，秋收后劳力没有外流，而是开展了热气腾腾的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冬一春完成了一百五十多项工程。

七年的实践证明，千方百计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农民的过程，也是全面、正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过程。这是大寨的一条根本经验，也是搞好学大寨运动必须认真做好的一件大事。这一条抓上去，学大寨运动就能够轰轰烈烈地、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四，让广大群众当家作主

革命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靠群众。能不能让群众当家作主，是能不能开展好学大寨的又一个关键性问题。在这方面，昔阳有经验，也有教训。

早在合作化时期，大寨就是昔阳县的先进单位。大寨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事迹，昔阳的广大群众是知道的。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大寨在昔阳，群众又热切地盼望象大寨那样把革命和生产都搞上去。按理说，昔阳学大寨，应该学在前、走在前了吧？但是，事实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学大寨只不过是一些人口头上的空话。那时候，群众说大寨好，有人却说：大寨的地亩是假的，产量是假的，卖粮是假的。大寨明明走的是一条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光明道，有人却说：越是先进问题

越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呢？原因很简单，这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的结果。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大寨大踏步前进了，昔阳却落后了，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一九六七年，昔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陈永贵同志问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是穿新鞋走新路，还是穿新鞋走老路？革委会的全体成员决心穿新鞋走新路。这条新路的头一步不是发几个号召，说几句大话，而是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全体委员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走遍了全县，访问了许多贫下中农，他们告诉我们：“昔阳要想变，就要听毛主席的话，走大寨的道路。”群众的意见是县革委会下决心的重要根据。正是根据全县广大群众的意见，县革委会才做出了三、五年内建设成大寨式县的决定，才发动了一个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轰轰烈烈的大批判高潮，推动全县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

七年来，我们体会到：让群众当家作主，首先要关心群众。文化大革命前，由于生产发展很慢，昔阳群众的口粮是很紧的。到一九六七年，光社员欠集体的粮就达二千多万斤。陈永贵同志说：“这不是群众欠了集体的债，而是修正主义路线欠了群众的债。”一九六八年秋，一下免除了社员两千多万斤的粮食债务。这样，就起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孤立最顽固的一小撮敌人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各级干部要认真而不是敷衍地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坚决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做错了事要允许人家批判。七年来，我们是年年搞整党的，我们的整党从来不关

门，也不小开门，而是大开门。基层党组织整党，要放在贫下中农中整，县、社两级整党，到群众中整，也要把群众请进来整。一年不是整一次，而是整两次、三次。一九七一年初，县里整党，我们就从农村请来了十个敢“放大炮”的党支部书记，先到县级机关中搞调查研究，以后又让他们参加县委常委的整风，到会上去摆问题，提意见。他们从基层到县级机关都了解了情况，给县委常委们提的意见尖锐、深刻。秋后召开四级扩干会，不是县里先作报告，而是让下边先给县委提意见，“放大炮”，搞大鸣、大放、大批判。这样，我们就能把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经常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一九六七年以后，全县学大寨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洪水公社到一九六九年，还是光空喊，不实干。

一九六九年，公社党委整风，把贫下中农、基层党员请来提意见。蒋秦宫大队的赵立山，就对公社党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公社领导：“坐在家里说话是空的，离开实践说话是虚的，脱离群众说话是假的。”他问公社党委还想不想革命？这些意见对公社党委震动很大。从这以后，公社党委才下了决心，带领群众千军万马齐上阵，三步并作两步走，原计划七年才完成的工程，干了两年就完成了，万米大坝控制了洪水川，三千亩河滩变成了良田。洪水川是怎么治出来的？是公社党委领导全公社群众干出来的，而公社党委却是在群众监督下干起来的。

还有一个三都公社，比洪水公社还要慢些。这个公社有条三都沟，二十二里长，直到一九七一年还不敢治理。公社干部下乡，社员问他们：“你们为啥不敢治三都沟？”党员